

沈已平設

新文學史筆記

編者的话

蔡儀同志講授的新文學史筆記上冊，終於和大家見面了。我們首先應該感謝蔡儀同志，他不但允許我們把筆記付印，而且還在百忙中抽暇給我們校訂底稿。

筆記的整理是大家分工合作的：第一章是輔仁男中整理的，第二章是五中整理的，第三章前半部是二中後前半部是工商中學整理的，第四章是華北中學整理的。其中閻振益，李慕白，潘遜泉，陳謨和曾鐸諸同志出力最多；我們今天能够人手一篇，是要感謝他們的。

新文學史講授紀錄

蔡儀先生講授

第一章 導言

(一) 什麼是中國新文學？

(1) 從來兩種普遍的答案的批判

(A) 「白話文學」或「國語文學」說的錯誤

這是產生最早的說法，以爲新文學的特點就在於它的用語的由文言改爲白話。此種說法是由胡適提出的，在他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中說：「然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爲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爲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這是胡適認爲新文學是白話文學的見解。又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他說：「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這是他又提出的國語文學的說法。但是這只是形式主義的看法，就是只看到新舊文學在形式上、用語上的不同，而未看到新文學之所以新不只是在形式上的這種改變；更主要的是在內容和精神上的改變；而形式上的改變正是由於內容與精神的改變所要求而然的。所以胡適的看法是錯誤的。他之所以會產生這種看法，從思想方法方面說：這種只看事物的表面而不看事物的本質

與內容的看法，是經驗論的實驗主義的看法。胡適的所以有這種思想方法，又是因為五四時期中國資產階級右派，雖然看到革命要到來了，但他們自己並不真正走上革命的道路，而只要求一點表面上的改革，並且要以這樣來避免真正的革命，同時他們自己對這些微的改革也就感到心滿意足了，這是改良主義。而資產階級右派的改良主義思想就正表現在胡適對新文學的看法上。

而且胡適自己的意見也有矛盾，他的「白話文學史」中列舉漢代以來的作品，如「大風歌」、「垓下歌」、「木蘭詩」、「孔雀東南飛」、「宋詞」、「元曲」……等，他認為這些作品和五四的新文學一樣都是白話文學。那麼新文學又新在那裏呢？提倡新文學還有什麼意義呢？至於所謂國語文學，就是他自己也無法說明什麼是要創造的國語的文學，這是把新文學應該有的新的內容和新的精神給模糊了。然而這種錯誤的看法，影響到五四以後的人還認為新文學就是白話文學或國語文學，這是我們不得不特別提出來批判的。

(B) 「人的文學」或「平民文學」說的錯誤

這種說法在現在是沒有多大影響了，但在五四時期影響很大，一般人都認為新文學是人的文學或平民文學。這種說法是由周作人提出的，在他的「人的文學」中說：「我們現在應該提倡的文學，簡單的說一句，是『人的文學』，應該排斥的，便是反對的非人的文學」。人是什麼呢！

他說：「從動物進化的人類。」他又解釋說，所謂人是「靈肉一致的。」另外在「平民文學」中他說：「平民的文學正與貴族的文學相反。……我們說貴族的平民的，並非說這種文學是專做給貴族或平民看，專講貴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貴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過說文學的精神的區別，指他普遍與否，真摯與否的區別。」周作人的這種見解顯然較胡適爲進步，不但是從文學的形式上，而且從文學的內容上來說明。並且指出了文學的社會基礎和階級關係；但他依然說得不够明確，把具體社會中的人加以抽象化概念化，成爲空空洞洞的所謂靈肉一致的東西。把平民文學加以抽象化概念化，成爲不着實際的所謂具有普遍與真摯的精神的東西。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不根據具體事物和社會基礎，而以概念來代替它，這是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周作人的所以有這種思想方法，正是小資產階級右傾機會主義傾向的表現。看到了文學的社會基礎和階級關係，但又不能更進一步深刻的認識清楚，理解清楚，只加以概念化模糊過去，這說明了小資產階級對革命的動搖性和軟弱性。同時所謂「普遍與真摯」的精神的說法，本身也有矛盾。因爲平民文學固然需要真摯與普遍，但貴族文學也有它自己的所謂普遍與真摯的精神。自然只從平民兩個字上看，顯然是說新文學爲資產階級文學，但我們的新文學並非是資產階級文學。

(2) 我們的看法

(A) 新文學運動的基本精神是反帝反封建的

這是新文學與舊文學基本上不同的一點，這點在新文學的理論和創作上都表現得很充分。

在新文學的創作上這種反帝反封建的精神表現得尤其清楚，在現階段說來，如「白毛女」的主要精神是反對地主對農民的壓迫，暴露農村中超經濟的剝削關係，所以這是反封建的作品。如「劉胡蘭」是反對封建軍閥的統治和他的軍隊。又如「小二黑結婚」所表現的時代已到了抗戰後期，人民政權在農村中已經建立起來了，但封建勢力還相當濃厚；所以這篇小說是反對封建的婚姻制度，封建迷信和封建殘餘——惡霸的，因而說它也是表現着反封建的精神。

較前的作品也是如此，抗戰時期的作品主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的，土地革命時期的作品主要也是反帝反封建的。如「雷雨」是反對封建家庭，「千夜」是表現着農民起義，及工商業家遭受大資本家與帝國主義的壓迫的，也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卅大革命時期，郭沫若的「三個叛逆的女性」是以歷史故事表現現代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還有他的「女神」詩集中「女神的再生」是反對封建軍閥的戰爭的。當時其他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也是如此。

五四時間魯迅的「狂人日記」，他自己說，這篇小說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同時我們還可以加上一句說它指出了新文學的方向。它反對封建禮教和封建制度，認為過去的歷史都是人吃人的歷史，所以這篇小說的反封建的精神非常明顯。又如「故鄉」「阿Q正傳」都充分表現出了這種精神。

在文學理論方面這種精神也表現得很明白，我們現在的文學是遵循着「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指示：文學要歌頌新民主主義革命，要為工農兵服務，這當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抗戰初期提出抗戰文學，要反映着抗戰與民主改革。土地革命時期提出「革命文學」的口號，要文學與革命相結合，為革命服務，這都是有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精神的。

五卅大革命時期，文學研究會的主要批評家沈雁冰，在他寫的「大轉變時期何時來呢？」中說：「我們希望文學能擔當喚醒民衆，而給他們力量的重大責任。」他在雜感中並引用了惲代英在「八股？」一文的話說：「我以為現在的新文學若是能激發國民的精神，使他們從事於民族獨立與民主革命的運動，自然應當受一般人的尊敬。」創造社在理論上也有同樣的意見，如郭沫若在「我們文學新運動」中也提到反帝反封的意見，以後在「革命與文學」中，表現就更顯然。五四時期文藝理論意見雖不深刻，但是單從反對舊文學一點上也可以看出反封建的精神，而且也由反封建文學同時提到反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

這些都是舊文學所沒有的，「水滸」雖然是反對貪官污吏，但還要幫助宋天子把天下治理好，所以還不能說是反封建的作品。「紅樓夢」也寫出了封建貴族家庭的沒落一面，寶玉和黛玉要求婚姻自由，但他們不能有民主思想，這是受了時代的限制，不可能有真正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所以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是新文學不同於舊文學的特點。

(B) 新文學運動是以人民大眾爲主體的

這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面來說明：

一方面是指以人民大眾爲作品中的主要主人公。雖然有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不是人民大眾，而是地主等反動人物，但是對此等人物却是當作否定角色來處理的，所以真正的主人公還是人民大眾。

不但內容上是以人民大眾爲主要主人公，再有一方面，就是形式上也以人民大眾爲主要對象。

先講第一方面。新文學的主要作品都是以人民大眾爲主人公的。如「劉胡蘭」的主人公即是劉胡蘭。「白毛女」雖也着力描寫黃世仁，但主要角色是白毛女。「小二黑結婚」雖然也寫二孔明，三仙姑；但真正的主角是小芹和小二黑。抗戰初期的作品中的主人公是抗戰英雄，如曹禺「蛻變」中的丁大夫，專員和傷兵。土地革命時期，如丁玲「水」中的主人公是農民，矛盾的「子夜」中的主要人物是吳荪甫（吳原是民族資本家，民族資本家也包括在人民四個階級之內）。又如夏衍「包身工」亦是。五卅大革命時期，如「女神之再生」中的主人公是女神，老農夫，和牧童。魯迅的「彷徨」也是如此，如「祝福」中的主人公是祥林嫂。五四時期，以魯迅爲例，「呐喊」集中從「狂人日記」到「阿Q正傳」都是以人民大眾爲主要主人公，尤其是以農民爲主人公。

的更多，如阿Q、閻土等是。又如「一件小事」中的主人公是城市勞動者。所以新文學運動的主要作品都是以人民大眾為主要主人公的。

形式方面，新文學也是以人民大眾為主要對象的。如現階段的作品是要求能為人民大眾所理解，所欣賞。抗戰初期文學為要服務於抗戰，要求作品通俗化，大眾化。詩有採取民歌形式的，板話形式的。小說有模仿舊小說形式的。戲劇更為人民大眾所能看懂。土地革命時期，討論文學大眾化更為深刻，在左聯領導下，有些文藝工作者試寫通俗讀物，他們到弄堂、工廠去工作，寫短詩，及報告文學等。五卅大革命時期是新文學歐化的顯著時期，在文藝形式上走了些彎曲道路；但也有人從事搜集民歌民謡及民間傳說的工作。五四時期打倒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原是為了合乎大眾的要求。雖然當時從事文學的人，很少是有意識地為人民大眾服務，但却在無意中符合了這一要求。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解釋不避俗字俗語時說，提倡白話文，就為了要能「家喻戶曉」。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大眾化這一要求。

總之，在新文學形式上雖然有些曲折，但在新文學內容上却是貫徹的以人民大眾為主體。這也是和舊文學基本上不同的一點。

舊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不可能是人民大眾，就是偶而有之，亦是作為被嘲笑和被否定的對象。再者，舊文學的律詩古文，人民大眾根本不能理解，而作家也不要求他們理解，像白居易那樣

的詩人却只是少數例外而已。

(C) 新文學運動是無產階級革命思想領導的

這一點和上述二點是分不開的，要使新文學運動很正確的做到貫澈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和以人民大眾為主體，那麼就必須要無產階級革命思想來領導。但這並不等於說新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即指社會主義革命文學，是反資本主義的）。思想領導是指出正確的目標和達到這目標的正確的道路，而新文學的目標，簡言之，就是反帝反封建，要明確這目標和堅決走上達到這目標的道路，這就非是無產階級革命思想領導不可的。

我們若從文學理論上看，在現階段的文學理論的指導思想是毛主席的文藝思想。抗戰初期和土地革命時期的文藝理論和傾向，主要起作用的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理論，這是把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開始運用到中國文學上來的。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普列漢諾夫等的文藝理論被介紹到中國來了，其後又陸續介紹了高爾基文藝思想及蘇聯新現實主義的文藝理論。所以這個時期的新文學運動顯然是無產階級革命思想所領導的。

五卅大革命時期，文學研究會的沈雁冰的基本思想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思想，在他的「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中提出要「注意社會問題，同情於被損害者與被侮辱者。」郭沫若的「革命與文學」中說：「我們所要求的文學，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還

有，他在「我們的文學新運動」中也會說：「要在文學中爆發出無產階級的精神。」

五四時期的這一點，是容易叫人置疑的，其實我們都知道五四革命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是李大釗同志領導的；新文學運動是新文化運動中重要的一部份，所以新文學運動也是無產階級革命思想領導的。李大釗在新文學運動方面雖然沒有寫多少文章，但與他並肩作戰的陳獨秀却不能不受他的影響，而且陳獨秀也顯然在新文學提倡之初，即已初步的接受了無產階級革命思想；這樣看來，新文學運動是無產階級革命思想領導的，可以確信無疑了。

當時的文藝理論上雖然不能明顯看出無產階級革命思想，但從作品方面却是可以看出來的。

如魯迅的「狂人日記」，「故鄉」都表現出樸素的無產階級思想。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喊出「救救孩子！」，就是希望我們下一代，「不要被人吃，也不吃人」；也就是說「不被人壓迫，也不壓迫人」；也就是說希望將來是一個沒有剝削，沒有階級的社會，這就是樸素的無產階級思想。在「故鄉」裏魯迅聽到閔土管他叫「老爺」，感到兩人之間築起了一道高牆，再不像幼時是一對好朋友；因而希望，宏兒和水生之間不再有隔膜，而有大家一起的新生活。這種隔膜是由貧富造成的，是由階級造成的；所以他要打消隔膜，大家一起過新的生活，這就是樸素的無產階級思想。

過去許多人認為新文學運動是胡適領導的，那麼就不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而是資產階級領導

導的。對於這點，我們必須說是錯誤的。他們何以有那種錯誤的認識，是因為胡適寫了很多關於新文學運動的文章，自吹自擂，迷人眼目。胡適在新文學運動中並沒有寫過多好的文章。在當時他並沒有明白新文學運動的意義、目的和道路。他只是一個純形式的改良主義者，他所提出的八事大多是屬於形式方面的，在意義上又是消極的；即在形式上的改良，他的態度也不堅決，如「不避俗字俗語」一事，僅主張消極的不避而已，不能積極的主張去用俗字俗語。又如八事之中講得最多的是「不用典」，但他並未堅決地否定用典；相反地，他却把用典分成狹義與廣義兩種。而且說：「廣義之典，其實非吾所謂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又說：「狹義之典亦有工拙之別，其工者偶一用之，未為不可。」這簡直不是反對用典，而是主張用典了。所以他並沒有認清新文學的社會意義，也不能指出道路，運動展開後，又不斷表現妥協動搖。如他說：「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之所能定，……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但陳獨秀的態度是和他截然不同地，他說：「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的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而且他對文學革命的意義，目的和道路也講得很清楚；文學革命的意義是為了革新政治；三大主義，是指出了文學革命的方向和道路。而且他曾說過：「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態度是堅決勇敢，不顧舊勢力的責罵的。

當然，胡適寫「文學改良芻議」是在陳獨秀寫「文學革命論」之前，而且也給了陳獨秀以影

響；但胡文之作又是受了陳獨秀的影響。這從一九一六年「新青年」（二卷二期）上胡致陳的通訊中可以看出的。因為陳獨秀曾在一篇通訊（新青年一卷四期）裏寫道：「我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胡適很贊成這意見，才寫了上述那封給陳獨秀的信；而胡適這封信的主要論點，又和文學改良芻議裏所說的大致相同。一九一七年一月份「新青年」上在讀者通訊裏有鼓吹社會主義的主張，「新青年」四月份上陳獨秀會寫過一篇「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從這些文章裏，我們可以看出陳獨秀已經初步的接受了無產階級革命思想和俄羅斯二月革命的影響。

所以五四新文學運動，在總的精神上是由李大釗，在具體事實上是通過陳獨秀，可以看出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領導。看問題應從全盤來看，發展來看，不應單找小事件，小材料或小證據。如果說新文學運動不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而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或者說，胡適領導的，它不能有這種特點，不可能走上這樣正確的道路的。再以魯迅先生來說，他之具有樸素的無產階級思想，即是受了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領導和影響的緣故。如果定要找根據，那麼魯迅在「呐喊自序」中說：「既然是呐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這裏所謂的「將」，即指陳獨秀而言。所以我們說新文學運動是無產階級革命思想領導的，而不是資產階級領導的。

(D) 新文學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的文學

總上觀之，就是新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思想領導的，以人民大眾為主體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所以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學。

(二) 怎樣認識新文學史的發展規律？

(1) 怎樣考察新文學史？

關於這個問題，過去有些人主張要用所謂客觀的態度，所謂科學的方法，就是否認滲入主觀成分。認為若加入主觀成分，則易生成見或偏見，難得「史」的真象了。這種說法，聽來似乎很有道理，很能實事求是；其實這是似是而非的說法。因為「純客觀」是不可能的。一個人考察任何事物時一定要通過自己的主觀；既然一定要通過主觀，那麼所謂成見自然是難避免的了。有了成見是否還能得到史的真象呢？解決這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這主觀是怎樣的階級意識形態，若用一般的說法，就是怎樣的階級立場。以我們現在的情況來說，我們若是姑穩了革命的階級立場，接受了無產階級思想、馬列主義思想，用馬列主義的觀點方法，來研究新文學史，自然就能得到史的真象。這也就是我們考察新文學史應該先明確認識的。

(▲) 從新文學運動對革命運動的關係來看它的社會任務

從馬列主義的觀點來看，文學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它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和階級關係。文學是服從於政治的。那麼我們的新文學運動，基本上必然是服從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求的。同時

新文學運動在各個階段當中對革命運動也會起影響和作用。因此新文學運動和革命運動是分不開的，通過這種與革命運動的關係，就可以看出新文學的社會意義和社會任務。

所以若是把新文學運動孤立起來看，如胡適形式地認為文言文是死文學，白話文是活文學，因此而提倡白話文；那麼他必然的不可能瞭解新文學的社會意義，社會任務。

(B) 從新文學運動的矛盾鬥爭來看它的發展

新文學運動是有發展的，不會停止在那一點上；所以新文學運動在各個時期都有其不同處，各時期的理論不相同，創作也不相同；有變化，有發展。它的發展是根據着它的社會基礎；也就是受外在的影響——革命運動的影響。但這外在的影響，往往是通過新文學內部的矛盾鬥爭才表現出來，才造成新文學運動的發展。所以我們必須考察其內部矛盾鬥爭的發展，才能了解新文學運動的真正的發展情形。

(C) 從新文學運動的發展過程來看它的主要條件及主導傾向

我們對新文學運動的發展，應該看出它通過一些什麼主要條件，表現着什麼樣的主導傾向；在其中我們就可以看出新文學運動的發展規律。因為在新文學運動的發展中，雖然有些東西是在變化，但也有些東西是根本不變的（如上面所講諸特點即是）。譬如以五四時期的文學和土地革命時期的文學來比較，從表面看來是不相同的；但我們若追求造成這種不同的原因，還是由於它

的主導思想，即無產階級革命思想領導的加強；它的主導傾向，即和革命運動結合的更密切。

(2) 新文學運動的發展規律

(A) 新文學運動與革命運動的關係的發展

這兩者之間的關係，簡單說來就是：一方而新文學運動被革命運動所規定，另一方面新文學運動又對革命運動起了一定的反作用。所以新文學的理論和創作在各個時期中都對革命起過一定的作用，有過一定的貢獻。

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之所以發生，基本上即由於革命的要求所規定。我們知道五四革命運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開始。它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同時又有廣大的人民羣衆作基礎；這是它的兩個特點。這種革命運動就必須先要求一個廣泛的啟蒙運動，在啟蒙運動中宣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想意識。因此就必須有一種與廣大的人民羣衆有歷史淵源的工具，用來宣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這工具就是文學，而且是白話文學。所以白話文學的提倡，成為新文學運動最早的手號。

新文學運動發生後，對五四革命運動起了一定影響。因為它本身雖然是文學運動，但要提倡新文學，反對封建士大夫文學，就要反對封建的思想意識，及封建的社會制度。在當時，魯迅先生的作品就代表了這種精神，在知識青年中起了廣大影響；更由知識青年對社會起了更大的影響。

響。這從五四革命運動中的事實可以看得到的，五四運動起帶頭作用的是學生，而當時學生們對羣衆作反帝反封建的宣傳，喚起了小市民，以至於工人，使他們都參加了這一革命運動。由此可知新文學運動是對革命運動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後，革命運動又擴大了新文學運動，全國各地各校的學生會許多創辦了白話刊物，使新文學的國地擴大了。

五四以後至五卅大革命這一階段中，中國共產黨成立了（一九二一年），同時封建軍閥的統治也加強了，資產階級右派走向反動了。這種形勢對新文學運動起了規定作用，使文學革命的統一戰線起了分化。原來統一戰線中左翼，如李大釗、陳獨秀等走上了政治革命運動，右派的胡適就走向了反動。當時「新青年」雜誌已經成爲中共的機關刊物，而胡適却在辦努力週刊，提倡「好政府主義」。於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要革命又看不清革命的道路，感到苦悶彷徨，仍留在新文學陣營裏成爲新文學運動的主力。但在大革命運動發展過程中，許多作家參加了革命運動。

到了土地革命時期，革命運動進展到更新的階段，革命運動以農村爲根據地，以農民爲主力軍，這時資產階級的左派和右派已完全反動，所以中共領導農民向反動的資產階級也進行鬥爭。這些就規定了新文學運動的新的發展，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口號，同時文學作品上也反映了大革命的失敗及當時的革命運動情況。等到左聯成立後，號召作家要取得實際革命經驗，及瞭